2026 年 9 月 外国语 September 2026
第 49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49 No.5
文章编号：1004－5139(2026)05－0076－0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 国外社会学与翻译学界面研究述评

汪宝荣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翻译学与社会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交叉后，翻译社会学（国内亦称“社会翻译学”）随即兴起于西方，成为 21 世纪以来国际翻译学和社会学的重要进展之一。近 20 年来，西方翻译学者在科学社会学的启发下，展开了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界面研究，涉及二者发生交叉的动因、二者的关系、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等主题。本文基于研究现状梳理认为，国外相关成果揭示了学科地位和权力不对等对两门学科关系的深远影响，反映了一种试图提升翻译学科地位的学者焦虑，有助于推动二者交流互鉴、互惠合作，并指出国内研究者应在引入科学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促进中国的社会学与翻译学交叉和融合等方面展开探索。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社会学；翻译学；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界面研究

#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broad: A Critical Review

*WANG Bao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terse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ociology in the 1990s,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lso called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emerged in the West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either disciplin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estern translation scholars, inspired by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have explored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ing the causation of the two disciplines’ intersection,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ociology.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primary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y reveal far-reaching impact of disciplinary power imbala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ociology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cross-fertilization and reciprocal cooperation, while reflecting a scholarly anxiety about raising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also suggests avenue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by Chinese scholars, i.e.,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exploring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erse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oci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oci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作为文化产品的翻译，翻译学者则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本体问题，使得翻译学与社会学发生交叉，各自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即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和翻译视角的社会学研究。这两个术语具体明确，却不宜用作子学科名称。事实上，目前英

语文献大多用“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直译为“翻译社会学”)指该研究领域及交叉子学科(武光军 2020: 115)。鉴于社会学分支多以“sociology of #”格式命名,如“sociology of knowledge”(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科学社会学),笔者推断“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很可能出自社会学界。问题是不少翻译学者也用此术语,Wolf(2007: 6)更将其界定为“一门新的翻译学子学科”。这就模糊了其学科归属,进而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子学科名称之争(王洪涛 2011; 傅敬民 2014; 武光军 2020)。此外,吕世生(2013)、傅敬民(2014, 2018)、王洪涛(2016)、王东风(2017)、周领顺(2023)等学者还探讨了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及学科边界、翻译与社会的关系等。事实上,国外学者较早关注这些问题,且已形成名为“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研究领域,对应于研究科学的社会性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社会学(Buzelin 2013: 191, 194)。Wolf 率先提出该概念,指出近年来一些翻译学者在科学社会学的启发下,“从历史和体制的角度反思翻译学科的发展历程,讨论翻译学分支的兴起及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位置,探究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的社会条件”(Wolf 2007: 14, 25–27)。后来她进一步阐明,该术语主要指对翻译学与社会学发生交叉的动因、二者的关系、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等的“元层面(meta-level)的讨论”(张汨、沃尔夫 2017: 48)。

对于国外同行在该领域的研究,我们的关注和了解尚有限。目前仅见笔者以“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为题做过粗略介绍(汪宝荣 2018: 84),且“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尚无确当的译名。张汨将其译作“翻译学的社会学”(张汨、沃尔夫 2017: 48),武光军(2020: 115)则译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笔者认为两个译名虽中规中矩,但都未能揭示其研究主题和内容,故试译为“社会学与翻译学的界面研究”。本文旨在,梳理、述评国外研究现状,兼论对推进国内研究的启示。

## 2. 国外研究概述

### 2.1 社会学与翻译学“迟到的联姻”

既然“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Tyulenev 2024: 249),社会学就理应把翻译作为其研究对象,翻译研究也早该采用社会学视角,而事实上二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发生实质性交叉[①]。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Holmes(1988: 72)用寥寥数语提议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注重功能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描述译作本身,而是其在接受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即研究的是语境,而不是文本。它着重探讨哪些文本在某时某地被翻译(以及哪些未被翻译这一同等重要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尽管翻译史和文学史常将其作为子主题或对立的主题加以介绍,它受到的集中关注不及注重产品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假如我们更重视这种研究,将开创一个名叫“翻译社会学”的领域(或可称作“社会翻译学”——虽不及前者贴切,但更准确,因为它既是翻译学也是社会学的一个正当合理的研究领域)。

Holmes 提出要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框架内开创“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但他又说用“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来指称更准确,并认为它既属于翻译学也属于社会学。Holmes 对该领域命名的两可态度和概念界定的不严谨,使其学科归属模糊不清,导致国际上术语使用一度不一致。此外,他未讨论社会学与翻译学该如何交叉,影响了构想的可操作性。事实上,它一度“被抵制”,有的翻译个案研究即便涉及社会学,也往往“被刻意掩饰”(Simeoni 2007a: 13)。到了 90 年代初,描述性翻译研究模式得以确立,一些翻译学者开辟了社会学视角;社会学界则“对译作在文学场占据的空间发生了兴趣”(Simeoni 2007b: 187),促成了翻译社会学的兴起。

傅敬民(2018: 92)发问:“为什么直至晚近才出现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维度?为什么社会学视角

① 傅敬民(2014: 101–102)注意到,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前,就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关照翻译研究。笔者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前从社会学视角关照翻译研究是零星的,二者尚未发生实质性交叉。

的翻译研究热潮会发生在文化翻译研究之后？”对此，国外翻译学者进行了剖析和反思。Wolf（2007：3）认为，80 年代后期发生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宽了翻译学的框架，把历史视角、社会语境、翻译规范等纳入其中，凸显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和宏观语境。即是说“文化转向”催生了翻译社会学。她分析指出，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论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它忽略行为者和机构，“未能阐明哪些力量使系统发生动态变化”；Toury 借用社会学概念“规范”（norm），认为翻译“基本上受规范制约”，并论及译者如何内化规范，让人联想到同样需内化的惯习（habitus），但他“忽略了规范运作的社会语境”；而 Lefevere（1998）通过吸纳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概念，拓展了翻译赞助人理论，在开拓社会学路径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Wolf 2007：6–10）。Tyulenev（2024：253–255）认为，Lefevere 间接接受了 Luhmann 的社会系统论，将文学和翻译视为“既按自身规则运作又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系统”，他提出的重写理论“把我们带到了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门口”。

有社会学背景的 Simeoni 从两方面进行剖析：社会学在 19 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何一百多年后才把翻译作为其研究对象？为何翻译研究要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采用社会学视角？他分析指出，欧洲社会科学的工作原理都扎根于各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土壤（Simeoni 2007a：26），且国家机构的研究有一种“狭隘地方主义”的传统（同上：18），因此社会学家一般只关注本民族国家的社会问题，不关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渗及翻译问题（同上：23）；“这种排他性思维自 19 世纪末即嵌入欧洲社会科学中，导致翻译长期未能成为其研究对象”（同上：25）。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开始正面关注、探讨翻译：Bourdieu（1990）强调出版和翻译对于思想观念国际传播的重要性；Heilbron（1999）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图书与跨国文化交流，继而与 Sapiro 合作研究翻译图书国际流通和出版策略；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一书中，Casanova[②]（1999）论及翻译的两个社会功能，即助力用边缘语言写作的作家获得世界文学场域的认可，帮助“贫瘠”的目标语积累语言—文学资本（Casanova 2004：133–137），表明被视为“积累文学文化资本和获得国际认可手段”的翻译成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Inghilleri 2020：197）。至于为何翻译研究到 90 年代才采用社会学视角，Simeoni 指出，70 年代中期崛起的翻译研究学派力图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翻译问题的学科，当时这些学者认为社会学视角是“次要的”，对 Holmes 的提议做出了“延迟响应”（Simeoni 2007a：15）；后来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历史学和社会学走到翻译研究的前台，一些欧洲的翻译学者率先开拓社会学路径，其他地区的翻译研究者随后跟进（Simeoni 2007b：187–188）。

Buzelin & Baraldi（2016：118）认为，可从三方面解释翻译研究为何采用社会学视角：翻译分析单位由文本扩展到语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视角能为翻译研究带来多样化和新路径；学者们认识到翻译推动社会发展和变迁。对于为何到 90 年代才引入社会学视角，Buzelin 的看法与 Wolf 相若。她认为，注重语境和动态性、面向目标文化的多元系统论“为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铺平了道路”，但它本质上“脱离（行为者）实体”（disembodied），一些研究者从 90 年代起聚焦于翻译行为者，以克服其局限；Bourdieu 的场域理论注重行为者及其能动性，因而最早被引入翻译研究（Buzelin 2018：339–340）。Buzelin & Baraldi（2016：118–120）还指出，社会科学之所以迟迟没有正面关注翻译，一是因为它一向注重研究权力结构、市场、法律体系、社会再生产等宏观问题，忽略了以交际互动为特点的翻译实践；二是长期以来的社会偏见所致，即把译者视为简单的翻译“机器”，认为译者的工作就是完整准确地传递信息，而不是一种推动社会建构和变革的实践。

综上，在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由于学科发展内在需要（翻译学和社会学彼此需要对方，以开拓新的研究对象或视角）和主观因素（出现了欲拓展新的研究对象及视角的社会学家和翻译学者）的合力推动，社会学与翻译学发生实质性交叉，逐渐形成“翻译社会学”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

② 著名文学评论家，1997 年在 Bourdieu 的指导下完成该书对应的博士论文。

### 2.2 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

传统上，社会学界很少正面探讨翻译，尽管一些社会学家的思想和言论“暗示了社会学视角进入翻译研究的多种路径”（傅敬民 2014：105）。Simeoni 指出，翻译是一个“边界模糊的中间地带”（2007a：13），且它“不是普通的客体，要将翻译‘客体化’无疑是不容易的”，因此社会学家一般不愿讨论翻译（同上：26）。Buzelin（2013：196）认为，这可能因为在社会学家看来，“翻译属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或属于细枝末节，或是不值一提的日常社会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结果是长期以来翻译基本上被社会科学忽略。到了 90 年代，一些欧洲的社会学家率先关注作为文化产品的翻译。在《论思想的国际传播之社会条件》一文中，Bourdieu（1999：222）指出，文本进入国外场域须经选择（包括哪些被翻译出版、由谁翻译出版、由谁写序推介等）、贴标签、分类和编入丛书、被阅读等过程，并强调“文本进入接受场域的条件和方式是一个亟须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领域”。该文最初用法语发表于 1990 年，启迪、引领 Sapiro、Heilbron 等人着手研究翻译图书出版与流通。2002 年，Bourdieu 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报》连推两个专号，分别以“翻译与国际文学交流”和“思想的国际传播”为主题（Heilbron & Sapiro 2002a，2002b）。在题为《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翻译》的编者序中，Heilbron & Sapiro（2002c）呼吁社会学界重视作为文化产品及社会事实的翻译。

此后，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有了一定的位置。Schögler（2017：400）指出，当前“翻译也是科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家把翻译视为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以促进对知识生成的理解，或解释社会学史的特殊性、社会学概念的演变及社会学思想的翻译问题。Schögler（2018：62）把翻译视为“公开和私下发生的知识生产的形式”，指出翻译促进人文社科知识的国际传播和经典化，可见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翻译已成为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Milani（2022：240–241）一语道破其中的缘由：“如果我们承认翻译的社会维度，就得分析文化（包括话语、实践、价值体系等）之于翻译的重要性。”英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的《文化社会学》在 2015 年推出题为“21 世纪初的文学社会学：远离中心”的专号，收入 Van Es & Heilbron（2015）和 Sapiro（2015）的研究论文，分别探讨荷兰、法国作家作品如何通过翻译出版进入英美的文学场域，表明文化社会学对翻译的密切关注。

Mellinger（2025：165）注意到，与翻译学相邻的学科对翻译的兴趣“一直较有限”，最近才有学者讨论翻译对本学科的影响，如 de Casanova & Mose（2017）指出语际翻译对于民族志研究过程及写作的重要性。Bielsa（2023，2025）提出“翻译的社会学”（translational sociology）[③]一说，旨在揭示翻译在当今社会关系中无处不在的事实，考察翻译在国际政治中的干预和调解作用，促使社会学界关注从本学科视角难以解释和分析的翻译面向。“Bielsa 的社会学理论聚焦于翻译，既是研究社会的路径，也是社会实践的基础”（Tyulenev & Luo 2025：xxii），能促使社会学界进一步重视翻译。

翻译长期被社会科学忽略或回避，如今已成为科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志等的研究对象，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仍不容乐观。Tyulenev（2023：70）注意到，“翻译学者探讨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已有半个世纪，社会学家对作为社会现象的翻译的关注则少得多”。Bielsa（2023：46）也指出：“社会学界普遍不承认且忽略翻译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 2.3 翻译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目前国外学者就二者关系的讨论聚焦于两点：一是翻译学需继续汲取社会学理论的养分，二是翻译学应设法“反哺”社会学。第一点毋庸置疑，因此相关讨论不多。Buzelin（2013：195）认为，“社会学路径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动向，目前尚未取得预期的所有成绩，但其正当合理和重要性已无须论证”。Wolf 认为，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用社会学理论还在探索中，

③ 不同于 Holmes 提议的“translation sociology”。为区分起见，姑且译为“翻译的社会学”。

还需从社会学汲取更多养分(张汨、沃尔夫 2017: 50)。Buzelin(2013: 196)曾提议引入注重行为者的其他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积极回应,《劳特利奇翻译学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入 5 个社会学理论条目,包括新增的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和 Goffman 的符号互动论。二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尚在探索中,很值得期待。

21 世纪初就有学者反思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Kaindl(2004: 64–65)勾勒了二者关系的 3 个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指语言学将其理论、概念和方法强加于翻译研究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动输入”阶段,指翻译学从相关学科大量借用理论和方法的八九十年代;“互惠合作”阶段,指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共同提出理论、概念和方法,最终相互增益。Snell-Hornby(2006: 164)认为,90 年代以来的跨学科翻译研究属于 Kaindl 界定的第 2 阶段,“在新世纪的头几年,我们该思考翻译学能向其他学科回馈或‘输出’什么”,以实现“互惠合作”。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探讨了翻译学“反哺”社会学的问题。Meylaerts(2008: 94)认为,场域理论主要关注一国情形,很少考虑跨文化语境,“如把译者的跨文化惯习融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分析框架中,翻译学能为 Bourdieu 的理论提供必要的修正”。Inghilleri(2009: 282)指出,对于什么构成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社会学理论应如何干预或评论复杂的现代社会等问题,目前社会学界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观点各异,而翻译社会学学者着重考察翻译和多重意义在多语言、多文化语境中的作用,“将大大影响当前社会科学界关于现代性及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分化、偶然性、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争论”。Buzelin(2013: 196)认为,翻译研究者应尝试分析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经翻译后如何进入一门语言中不同的话语场以及不同的语言乃至符号系统,“这将是翻译学对科学社会学(或 Latour 的联结的社会学)的一大贡献”。Schögler(2017: 405)着重提到,“翻译社会学有助于人们从社会学视角认识文化迁移、思想传播和社会变革等,以及多语言、多文化社会中的历史发展”。Zehnalová(2023: 56)认为,翻译学具有学科交叉性,意味着它须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输入”理论养分,同时可向其他学科“输出”翻译理论或模式,间接回应了 Snell-Hornby 提出的“回馈什么”的问题。

不难看出,以上主要是对“反哺”的路径和具体内容的构想。Simeoni(2007a: 18)注意到,关注翻译的欧洲社会科学学者“往往不承认甚至没有意识到翻译学者的贡献”。Zehnalová(2023: 56)也指出,当下翻译学学科交叉性和跨学科性愈加突出,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仍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可见它向其他学科的“输出”是“零星的,且有待证实”。由是观之,翻译学“反哺”社会学尚有待落到实处,二者要实现“互惠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3. 评论与启示

### 3.1 国外研究现状简评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和翻译学分别发轫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二者的制度化和发展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翻译社会学兴起于西方顺理成章。其开创者或推动者 Heilbron、Sapiro、Wolf、Inghilleri、Meylaerts 等均来自欧洲,当然不是巧合;Gouanvic、Simeoni、Buzelin 等来自加拿大的法语区,则还与法国学者 Bourdieu 的理论被最早引入翻译研究有关。其中的翻译学者在科学社会学的启迪下,探讨了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界面问题,指出两门学科之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实质性交叉,是因为当时学科发展需要和主观因素已到位;翻译已成为几个社会学分支的研究对象,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处于边缘位置;翻译学需继续汲取社会学的养分,同时应积极寻求“反哺”社会学的路径。以上探讨揭示了学科地位和权力不对等对两门学科关系的深远影响④,也反映

④ 傅敬民、李亚峰(2023: 8)也指出,二者的融合不是“平等对话”而是作为成熟学科的社会学向翻译学“输出”理论与方法的结果。

了论者们试图提升翻译学科地位的一种焦虑，有助于二者达成交流互鉴、互惠合作关系。

除了对两门学科发生交叉的动因有全面深入的剖析，已有研究以反思、评述或构想为主，虽不乏洞察力和前瞻性，但分析深度略显不足。这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其性质是“元层面的讨论”。其次，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和两门学科的关系还在发展变化，“由于缺乏历史距离，我们难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Buzelin 2013: 195）。这是分析深度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再次，界面问题涉及社会学和翻译学，而目前关注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学者，Heilbron、Sapiro 等社会学家迄今很少探讨。他们的参与必将带来另一种视角和新的洞见。

翻译与社会的关系是“翻译社会学与社会学翻译研究之间的重叠部分，二者都可能予以考量研究”（傅敬民 2018: 96），目前国外探讨还不多。Simeoni（2007a: 13–14）指出，要厘清翻译与社会的关联，阐明翻译和译作在社会中的作用、翻译实践的社会维度、塑造全球翻译政治的复杂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等等，均非易事，因此“最近才有学者论述翻译的社会性”。Tyulenev（2024: 249–255）梳理了西方译论史上关于翻译与社会的重要论述，指出“译作既受社会现象和进程的影响，也影响社会现象和进程”。前者指向“翻译的社会性”，后者体现了“社会的翻译性”（傅敬民、张开植 2022）。

国外学者对术语统一问题有所关注，但未出现命名之争。在 Wolf & Fukari（2007）合编的重要论文集中，除了 Simeoni（2007b）用“socio-translation studies”、Gambier（2007）用法文辞“socio-traductologie”，其他作者均用“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指该研究领域。Wolf（2007: 31）认为这表明“本研究领域尚在形成中”，一旦我们认清翻译的社会运作机制，或许就能统一术语的使用。后来她又指出，“socio-translation studies”含有合成词“socio-translation”，且不能明确揭示社会学视角，因而没有得到普遍认可，“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则被“广泛认可和使用”（张汨、沃尔夫 2017: 48）。笔者认为该自然选择另有原因：“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符合社会学分支命名惯例，因而成为社会学学者的首选，不少翻译学者也袭用之；Holmes 声称“socio-translation studies”既属于翻译学也属于社会学，因此不少翻译学者排斥之。目前，翻译学者和社会学学者共用“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研究侧重点却有明显区别，即前者探讨翻译本体问题，后者关注作为文化产品或社会事实的翻译，按理说应区别开来。笔者未见国外学者专门探讨该问题。

### 3.2 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着重探讨了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及学科边界、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交叉子学科名称等问题，关注点与国外学者有所不同。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一个主题集中的研究领域，给国内研究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引入科学社会学视角。国外学者对界面问题的关注源于科学社会学的启迪，其探讨有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引，而国内论者往往是学科建构意识驱动。如能从科学社会学视角讨论界面问题，我们的视野将变得宏阔，探讨的问题会更系统、更聚焦。

第二，探讨翻译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与国外情形相仿，中国的社会学界也很少正面探讨翻译[⑤]，因为他们“有比翻译更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或社会事实需要探讨”（傅敬民、李亚峰 2023: 12）。着力探讨、揭示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能使国内社会学学者充分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从而对翻译发生兴趣，进而开展翻译视角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推动中国的社会学与翻译学发生交叉。胡牧（2013）、王洪涛（2025）分别探讨了翻译研究如何借鉴马克思的生产实践与社会交往理论、边燕杰的关系社会学理论，但实际应用及后续检验尚需落实。译学界应积极推动社会学与翻译学发生实质性交叉，一方面须确定哪些本土社会学理论

⑤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涉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间接讨论了文化外译问题（王洪涛 2025: 48）。

可用于翻译研究，进而通过个案实证研究加以检验，逐步将翻译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起来；另一方面，翻译学应主动设法“反哺”社会学，以促进二者达成交流互鉴、互惠合作关系。

第四，处理好交叉子学科名称问题。因中西学术传统不同，国外学者大多对此持开放态度，即顺其发展，接受自然选择的结果，国内学者则历来重视学科名称之立，因而引发命名之争。王洪涛（2011）认为“社会翻译学”更适合用作该翻译学分支学科之名，武光军（2020）则建议用“翻译社会学”。傅敬民（2014：102）冷静公允地指出，二者都让人觉得“有点怪异”，影响了国内学界对它们的认可。鉴于国内的翻译视角的社会学研究尚有待展开，目前不会引起概念混淆，笔者认为二者作为该翻译学子学科之名均可接受。周领顺（2023：101）也认为“继续争论下去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们不妨参照国外的做法，当前可任其二名并立，最终接受学界的自然选择。

## 4. 结语

翻译学与社会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交叉，各自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即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和翻译视角的社会学研究。近 20 年来，国外翻译学人在科学社会学的启发下，展开了翻译学与社会学的界面研究，聚焦于二者发生交叉的动因、二者的关系、翻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等问题，对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也有所探讨，揭示了学科地位和权力不对等对两门学科关系的深远影响，反映了一种提升翻译学科地位的焦虑，有助于推动二者交流互鉴、互惠合作。除了对交叉的动因有全面深入的剖析，已有研究以反思、评述或构想为主，分析深度略显不足，但不乏洞察力和前瞻性。国内的翻译社会学肇始于引进、借鉴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探讨界面问题稍晚于西方，且关注点有所不同，尚未形成一个主题集中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一般在学科建构意识的驱动下探讨界面问题，或许不够全面深入，但有的观点颇具前瞻性，如指出翻译学“到了需要思考如何为其他学科输送养分的时候”（傅敬民 2014：104）。国外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包括：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集中、系统讨论界面问题，探讨翻译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推动中国的社会学与翻译学发生交叉等。以上种种努力将使我们透视本质、把握现状、确立目标，或能推动国内社会学学者正面关注、讨论翻译，进而开展翻译视角的社会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建构中国的社会翻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以牢固确立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地位。

**参考文献：**


[1] Bielsa, E. *A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 Bielsa, E. Towards a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C]// Tyulenev, S. & W. Luo.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3] Bourdieu, P.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J]. *Romanisch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geschichte*, 1990, (1/2): 1−10.

[4] Bourdieu, P.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ideas[C]// Shusterman, R. *Bourdieu: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an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5] Buzelin, H.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Millán, C. & F. Bartrin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6] Buzelin, H. Sociological models and translation history[C]// D'hulst, L. & Y. Gambier. *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 Sources, Concepts, Effect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8.

[7] Buzelin, H. & C. Baraldi. Sociolog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wo disciplines meeting [C]// Gambier, Y. & L. van Doorslaer.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6.
[8] Casanova, P. *Le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M]. Paris: Le Seuil, 1999.
[9] Casanova, P.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M]. Translated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de Casanova, E. M. & T. R. Mose. 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y: Representing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English[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7, 12(1): 1−23.
[11] Gambier, Y. Y a-t-il place pour une socio-traductologie? [C]// Wolf, M.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12] Heilbron, J.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999, 2(4): 429−444.
[13] Heilbron, J. & G. Sapiro. La traduction: Les échanges littéraires internationaux [C]. Special issue of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 2002a, (144).
[14] Heilbron, J. & G. Sapiro.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 [C]. Special issue of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 2002b, (145).
[15] Heilbron, J. & G. Sapiro.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un objet sociologique[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s*, 2002c, (144): 3−5.
[16] Holmes, J.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Rodopi, 1988.
[17] Inghilleri, M.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C]// Baker, M. & G.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nd ed.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 Inghilleri, M. Field theory [C]// Baker, M. & G. Saldanh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9] Kaindl, K.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Interdisziplinären Dialog. Am Beispiel der Comicübersetzung* [M]. Tübingen: Stauffenburg, 2004.
[20] Lefevere, A.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C]// Bassnett, S.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21] Mellinger, C. D. Researching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 Tyulenev, S. & W. Luo.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22] Meylaerts, R.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 Towards a soci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C]// Pym, A., Shlesinger, M. & D. Simeoni.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23] Milani, M. Cultural sociology [C]// Zanettin, F. & C. Rundle.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Method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24] Sapiro, G. Translation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French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J]. *Cultural Sociology*, 2015, 9(3): 320−346.
[25] Schögler, R.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Korgen, K. O.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og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6] Schögler, R. Y. Transl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Circulating and canonizing knowledge[J]. *Ali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 2018, 38(1): 62−90.
[27] Simeoni, D.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ual relationship[C]// St-Pierre, P. & P. C. Kar. *In Translation –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a.

[28] Simeoni, D.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 in context and in practice [C] // Wolf, M.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b.
[29] Snell-Hornby, M.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30] Tyulenev, S. Review of *A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J].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23, 7(1): 70−73.
[31] Tyulenev, S.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ies [C]// Lange, A., Monticelli, D. & C. Rundle.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32] Tyulenev, S. & W. Luo. Introduction [C]// Tyulenev, S. & W. Luo.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33] Van Es, N. & J. Heilbron. Fiction from the periphery: How Dutch writers enter the field of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J]. *Cultural Sociology*, 2015, 9(3): 296−319.
[34] Wolf, M. Intrdou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Wolf, M.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35] Wolf, M.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36] Zehnalová, J. Digital data for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J]. *Acta Universitatis Carolinae. Philologica*, 2023, (2): 55−71.
[37] 傅敬民. 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问题与前瞻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6): 101−111.
[38] 傅敬民. 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性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 (4): 91−97.
[39] 傅敬民, 张开植. 翻译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翻译性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1): 120−127.
[40] 傅敬民, 李亚峰. 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借鉴与创新 [J]. 外语教学, 2023, (5): 7−13.
[41] 胡牧. 翻译研究: 转向社会——对转型期我国译论研究的思考 [J]. 外国语, 2013, (6): 72−79.
[42] 吕世生. 社会学的“翻译转向”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3, (5): 107−112.
[43] 汪宝荣. 西方社会翻译学核心研究领域: 述评及启示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6): 81−89.
[44] 王东风.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翻译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 (3): 449−455.
[45] 王洪涛. 建构“社会翻译学”: 名与实的辨析 [J]. 中国翻译, 2011, (1): 14−18.
[46]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研究: 考辨与反思 [J]. 中国翻译, 2016, (4): 6−13.
[47] 王洪涛. 中国社会翻译学的创新发展: 立足本土的理论建构 [J]. 上海翻译, 2025, (4): 45−51.
[48] 武光军. “翻译社会学”与“社会翻译学”: 基于社会学的翻译研究之学科名称辨析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5): 113−119.
[49] 张汨, 沃尔夫. 翻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米凯拉·沃尔夫教授访谈及启示 [J]. 东方翻译, 2017, (6): 46−52.
[50] 周领顺. 社会路径的翻译研究: 一个批评性视角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 (3): 97−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22BYY01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科研招标项目“社会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与应用研究”(CTS202106)

**收稿日期:** 2025 − 12 − 23
**作者简介:** 汪宝荣,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视听翻译。